

吴义勤卷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目击与守望

山东文艺出版社

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



吴义勤卷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目击与守望

山东文艺出版社



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目击与守望 / 吴义勤著.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1.12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吴义勤卷)

ISBN 7-5329-1991-9

I . 目... II . 吴... III .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作品集—中国 IV .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199 号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千字 /214

印 数 1—1300

定 价 13.80 元



吴义勤，1966年生于江苏海安。1984年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95年毕业于苏州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95年7月赴山东师范大学任教。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山东省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出版有《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等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曾获“山东省刘勰文学评论奖”等多种奖励。

责任编辑 于克平
封面设计 刘小军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第一辑

- 张继卷 村长的耳朵 (小说集)
凌可新卷 避邪 (小说集)
王方晨卷 王树的大叫 (小说集)
路也卷 我是你的芳邻 (小说集)
刘玉栋卷 我们分到了土地 (小说集)
老虎卷 潘西的把戏 (小说集)
陈原卷 大地的语言 (散文集)
王黎明卷 贝壳说 (诗集)
张宏森卷 战争笔记 (电视文学剧本集)
吴义勤卷 日击与守望 (文学评论集)

目 录

先锋的还原	1
文人缺席的时代	15
现实主义：当下写作的魅力	18
乱花渐欲迷人眼	23
媒体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	28
可疑的文体	33
“写真实”与“真实性”	40
“集体喧哗”与“个人声音”	60
“生病”的小说	64
小说的起点与小说的终点	68
	1
生存之痛的体验与书写	78
人与文：完成的以及未完成的	91
陶然小说的世界图式和艺术图式	108
尴尬的“经典”	128
《班主任》：一个“超文学”的文本	132

“重写文学史”的难度与希望	138
一个美好的学术设想	145
无限性的文本	151
拷问灵魂之作	166
抵抗世俗	176
生命的法则与历史的血肉	182
执著于大地的抒写	187
大地歌吟	190
崩毁的“象牙塔”	201
苍凉的生命之诗	214
过于沉重的写作	219
回归平凡	224
沉实朴素又一年	230
《新西游记》：颠覆性的写作	237
纯粹的长篇	242
一部诗意图而大气的长篇	246
“合唱”的魅力	250
忧患意识与“真实性幻觉”	255
追问“现代性”	259
关于矫健的三言两语	263
艺术的反思与反思的艺术	267
跋	陈思和 284
后记	289

先锋的还原

世纪之交的中国无疑正经历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转型。不绝于耳的文化喧闹和层出不穷的话语更迭使我们这个商业时代充塞了令人目不暇接的文化闹剧。“文化”在商品化的普及和推广中迅速地膨胀着，MTV、卡拉OK乃至我们日常生活中吃、喝、拉、撒等最具世俗性的方方面面都顷刻间被烙上了文化的印痕。一切都“文化”了，我们已经无法在这个文化的狂欢节中寻找“文化”与“非文化”的区别。显然，文化在它的普及和世俗化过程中被“非文化”化了，文化在辉煌的同时却蚕食了它自己的本质，从而远离了它曾经令人炫目的精神属性。而我们时代的文学在其“文化”化的过程中也逐步远离了它的边缘状态而具有了“轰动”效应，寂寞的文学如今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了炙手可热的热点，这种充满喜剧性的神话实在让人目瞪口呆。文学不再神圣也不再高贵，它切切实实地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极普通的文化消费品。我不知道文学这种轻而易举的民间化和普及化究竟是文学的成功还是文学的失落，也许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转型期的必然成果。然而，当我在一个时刻面对先锋小说的命运，总有一种无法遏止的黯然

神伤。先锋派的民间性还原和通俗化转型这样一个文化事实我很长时间都不愿正视和承认。作为一个热心的先锋鼓噪者，我无法面对这个事实带给我的自我否定和自相矛盾。因此，我很长时间都把有关这一事实的话语压抑在意识最深层而不愿捡起。但不管怎么说转型期的先锋派能在自我还原的同时完成对于先锋性和通俗性这水火不相容的文学两极的融化与嫁接，仍然是值得言说并能赢得敬意的。

—

虽然，在理智上我们也许会为文化的消费性、经济性吞没了文化的精神性和神圣性而痛心疾首，但平心静气地想想，这种阵痛性的文化转型也确实为我们反思文化和文学的本质提供了一种新的尺度和参照。对于先锋派来说，不仅在作家意义上他们“先锋”的光圈被剥落了，而且在公民和人的层次上他们也被还原成了普通人。尽管这种还原在我们看来既有自觉和主动的一面，也有不自觉和被动的一面。但无可怀疑的是，在时代的试金石面前，先锋派已经逐步呈现出了他们的“本真”状态。在此之前，我们关于先锋派的期望和幻想在他们还原为自身之后也已经袒露出了一厢情愿的乌托邦本质。真实令人痛苦，但真实毕竟让人清醒，只有在这种真实面前，我们才可能真正走进中国作家的心灵世界。

中国的作家和文人有着几千年的清高传统，重名轻实，重义轻利，“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他们在漫长历史长河中世代相袭、引以为荣的人生哲学。而在我们的印象中先锋派作家更是把这种清高哲学发扬光大到了极致，他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形象是甘于寂寞、“荷戟独徘徊”的文学

清教徒形象。独居文学的象牙塔内，他们不停地创造出为读者冷落的文学精品，其不计利害得失、功过荣辱的悲壮令人油然而生敬意。他们的文学眼光更是具有超越性，他们从来也不愿为当下读者写作，某种意义上说现世读者的茫然无措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他们的一部部“传世之作”所召唤的本质上并非是当下读者而是诞生在未来世纪的“假想读者”。在先锋派这里被拒绝非但不是一种耻辱而是一种荣耀，他们不但借此巩固和维护了神秘清高的人格形象，而且更证明了作为“阳春白雪”的先锋文学的超前性和前卫性。而广大的世俗读者虽然对先锋派的莫测高深望而却步，但对他们陌生的人生方式仍不失敬意，正如对待某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事物一样。这样，在世俗读者眼中先锋派人生和他们的作品被等同了，先锋小说所描述的对当下世俗生存图景的拒绝也就顺理成章地被误读为先锋作家自身对世俗的拒绝。这样的结果就导致了对先锋派人生和人格的文学化和艺术化的阐释，也导致了清高作为一种文学和人生境界的神圣化理解。

然而，当大规模的文化转型变成现实，当经济原则和金钱原则彻底击溃了精神原则的时候，清高的传统就……触即溃了。中国的文人作为一个整体几乎是转眼之间就完成了对清高时代的告别和抛弃，纷纷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手段，重新创造自己的生活史：走向世俗，为争取更多的实利而奋斗。而在整个整体性的奔赴世俗的文人大军中，先锋派的世俗还原尤其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从清高中乍醒过来而落入世俗物欲的“昔日先锋”甚至比那些天生世俗的人更富于算计和钻营。他们花样百出的世俗本领证明了他们从前的自命清高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误会和骗局。我相信，清高对于先锋派来说从来就不过是一种姿态，一种伪装，一种自我安慰，一种生存策略，一种在受到压

抑时聊以自卫、自慰的手段。清高从来也没有成为他们的禀性，融入他们的入格中并升华为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显然，中国文人的清高不但具有局限性、脆弱性、虚伪性，而且本身就饱含了世俗的因子。一旦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比如我们眼下的文化转型），这种世俗很快就会抽茎发芽原形毕露。

我们终于发现，先锋作家其实并不是想象中那种淡泊功名的清高之士。他们成名的焦虑实在远甚于这个商业社会中的任何一位凡夫俗子。他们之心甘情愿地居于文学主流话语之外从事远离世俗的纯粹文学实验的壮举，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演。他们的故弄玄虚，他们的愤世嫉俗，他们的离经叛道……事实上都是在卧薪尝胆地寻找一个突围而出的缺口。他们是那样渴望进入意识形态话语的中心，是那样渴望被注视被谈论，以至于当他们有机会走出边缘状态时都显得迫不及待。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少数评论家（精英读者）为先锋派的鼓噪终于被汇入了时代的话筒之中，先锋作家开始被当作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文学精英而言说，先锋小说作品开始走俏畅销书场并借助于影视效应而声名远播。清高的先锋派们一下子就甩去了沉重的清高外衣奔出书斋投入世俗的河流畅游起来。作为世俗的名人，他们乐此不疲地晃动在全国各地的电视镜头和报刊封面上。他们有过寂寞和失落的痛苦，如今是他们加倍收获和享受荣耀的时候了，而“先锋”和“新潮”也开始脱离其本身的文学意义而纯粹作为一种荣誉被先锋派享用着。正是在一次次的粉墨登场中先锋派走到了前台，走出了他们的清高和神秘，从而彻头彻尾地还原为一个个俗人，一个个以名人的面目出现的俗人。

另一方面，先锋派也绝非“喻于义”的君子。当他们还原为俗人之后，其对金钱利益的追逐丝毫不逊于普通民众，文

学的经济效益在他们这里可以说被实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一旦撕去从前文学实验的伪装，创作的生产性特征就一览无遗。现今的先锋作家比任何时代的作家都要高产，不仅一年可生产数部长篇小说，而且选集、文集、全集铺天盖地。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的文学大师就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他们一方面以自己的赫赫大名占据各地的报刊杂志，另一方面又收获大量的金钱。先锋作家们显然正以他们卓尔不群的适应能力，成为我们文化转型期中最先富起来的文化阶层。而电脑的介入则更加加速了他们的高产和资本积累。这时的先锋派可以堂而皇之地下海、经商，也可以毫无顾忌地游乐消费。他们淹没于世俗的河流如此不着痕迹以至于我们常常能在世俗的人群中与先锋派摩肩接踵。先锋走进了我们，融化在我们之中，却没有一丝余响。我们茫然回顾只发现四溅的水珠，先锋派却永远地消失了逝去了。这样的结局令我们感伤。也许，先锋派作为一种文学存在，其最高的价值本就不是其实在性而是其理想性，我们是把先锋派作为一种精神宗教信奉着以对抗世俗的。我们盼望先锋的火炬能永远照耀我们的灵魂，这种企盼虽然不无一厢情愿的性质，但却是绝对真诚的。然而，先锋派的本意却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他们燃烧自己而发出的些微精神火光不仅不是为了照亮和引渡别人的灵魂，而且甚至也无意于照亮自己的黑暗。那纯粹是一星照明的火花，一旦他们找到跨入世俗领地的台阶和路径之后，火光就自然熄灭了。这真是一种阴错阳差的误读，一个巨大的时代误会。当我们从这个误会中醒悟过来时，那种我们用理想和热情浇灌起来的先锋派的清高已经烟消云散了。与此同时，我们关于先锋文学的理想也就注定了要遭受一次同样沉重的打击。因为真正的清高对于文人来说是绝对需要的，这种清高是根植于对物质文明本质的深刻了解和彻底

藐视之上的，它将牢固地以人格的形式存在，决不会一受到物质的诱惑就溃不成军。相反，这种清高将有助于作家个人精神的高度独立、升华和扩张并最终冲破整个物质世界的围困。正因为如此，对于我们时代这些弃绝清高而沉入世俗河流的先锋作家，我们还能期待他们有何作为？

二

当我们时代的文化转型把先锋作家们打回原形之后，他们世俗化的人生景观也随即颠覆了先锋小说文本的先锋性和超越性。面对先锋文本的迅速通俗化，我们阅读策略的调整也注定了无法避免。先锋派显然已经修改了他们早期对通俗小说深恶痛绝不屑一顾的态度，如今甚至表现出一种忘乎所以的喜爱，通俗乃至媚俗成了先锋小说文本的典型表征。作为一种现象，先锋小说的通俗化倾向首先体现在下面两个文化热点上：

其一，先锋小说的畅销情结。九十年代以来，经过精心商业包装的先锋小说纷纷以新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街头书摊上。“跨世纪文丛”、“先锋长篇小说丛书”等为传媒炒作的先锋小说文本甚至成了大众阅读的抢手货。这种奇迹至少从客观上证明了先锋作品通俗性的一面。而洪峰、铁凝、赵玫、苏童、叶兆言等先锋作家直言不讳地打出招牌制作“布老虎”之类的畅销书这一文化事实，更从主观上揭示了先锋作家对于通俗化血脉相因的亲近感。通俗化实在不是商业文化对先锋小说侵蚀与诱惑的结果，而是先锋作家一种非常主动的文化选择。

其二，先锋小说的影视情结。自从莫言、苏童、刘恒等先锋作家的小说经张艺谋之手搬上银幕获得巨大声誉之后，先锋作家对影视传媒的心向神往就变得不可遏止。而王朔的火爆则

更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在他的大旗之下先锋作家一个个跃跃欲试。不仅杨争光等人步其后尘直接办起了影视制作公司，而且苏童、格非等先锋作家也在品尝了名利双收的影视“禁果”之后一发不可收地投入了影视剧本的创作。时下正被大众传媒炒得沸沸扬扬的《中国模特》这个通俗剧作，其十一位作者就几乎是清一色的先锋作家。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先锋作家为了迫不及待的“触电”，许多人甚至心甘情愿地沦为张艺谋的“电影妃子”。一时间，张艺谋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权威的文化英雄，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睥睨一切的先锋作家也不得不向他顶礼膜拜。以至于当张艺谋要拍摄电影《武则天》的号令一下，竟有六位声名赫赫的先锋作家共同出手炮制出六部《武则天》。我真不知道，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文化奇迹还是一出文化闹剧？在我眼中，先锋小说的影视化也就是它的通俗化。导演的任务无疑就是抹去先锋文本的先锋性，从观众的趣味出发把先锋小说改写成通俗性的画面和音乐。先锋作家能够毫不心疼地目睹电影对自己作品的任意篡改和肢解，这一方面证明了先锋作家对通俗化的热情，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先锋文学自身的软弱性。毫无疑问，当先锋小说以通俗画面和通俗音乐的形式呈现时，它事实上已沦落为一种文化快餐。我们只能感叹在现代商业文明和科技革命的春风吹拂下，通俗化的潮流是如此锐不可挡，以至于我们只能再一次无可奈何地面对它对时代和人类精神花朵的吞食。

显然，这两个热点所涉及的先锋小说的通俗化问题还仅限于现象和背景的描述，这种描述具有显而易见的时代性和阶段性。当我们从当前的视角出发对先锋小说的历史作一总的回顾时，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更为惨不忍睹的现实：通俗性其实正是先锋小说的一种潜在的本质属性，无论从阅读意义、创

作意义还是从文本意义上来审视都是如此。

首先，小说的模式化倾向正是通俗小说的最典型特征。恐怕谁也无法否认通俗小说的模式化创作方式，其在主题、结构、讲述方式等方面都有相沿成习的“程式”。这种“程式”不仅被广大读者认同和接受，而且它本身就构成了通俗小说的一种特殊价值。而先锋小说虽然其最初的文本形态相对于通俗小说和传统小说具有某种革命性，并对中国读者的阅读和审美习惯构成了巨大冲击。但这种革命性很快就消失在不同作家周而复始的“复制”式写作中。中国先锋小说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在主题结构、语言方式、叙事原则等方面却均已形成了共同的“模式”与规范，天知道这是一个神话还是一个悲剧！可以肯定的是，当先锋作家的革命以其模式化的创作为终结时，其所谓的革命已经毫无意义。我甚至相信，先锋小说能在时下走红也正与它这种“模式化”的重复呈现沟通了读者通俗化的阅读记忆有关。不仅先锋小说主题逃不出“历史”、“暴力”、“色情”、“灾难”、“宿命”等通俗性话语，而且叙述方式上也是惊人一致地回忆、孤独、痛苦、痴想。读他们的小说总使人疑心这些先锋作品全出自一人之手。有人曾指出，对于先锋小说可以读单个作品而不能读作品集，可以孤立地进入一个作家的小说而不能接触先锋小说群体，这其实就是针对先锋小说的模式化而言的。先锋小说可以说是最无法经受整体审视和比较阅读考验的文本，它们的文本词汇、叙述语气、时空处置似乎都比通俗小说先进和现代化，但在模式化方面不仅与通俗小说殊途同归，而且毫无高明之处。

其次，先锋小说写作方式的模仿化也是通俗小说惯常的创作手法。如果说八十年代初国门初敞之际，先锋派的写作还呈现出很强的陌生性的话，那么当西方文学的经典纷纷进入我们

的阅读视野之后，先锋小说模仿的本性就暴露无遗。可以说，先锋小说的创新事实上只不过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甚至是已经被摒弃的传统小说的模仿。至此，先锋小说呈现在阅读意义上的先锋性顷刻就变成了一个深刻的讽刺。有人甚至苛刻地说只要五部外国小说就可以概括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先锋（新潮）文学史。这话虽然不无偏颇，却实实在在地击中了先锋小说的本质。我们知道，模仿是一种制作行为而不是一种创造行为，通俗小说对通俗文本和读者趣味的模仿除了能带给读者短暂的消闲快慰之外，并不能提供任何人生体验和灵魂震撼。在这方面，先锋小说与通俗小说相比不仅如出一辙，而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对作家人生体验的放逐可以说正是先锋小说走向末路的根本原因。具体地说，先锋小说的模仿方式有两种：一是翻译，二是改写。前者主要是针对先锋小说的叙述方式而言，在先锋文本里我们可以发现两个西方文学的图腾，这就是马尔克斯和法国新小说。由衷的崇拜和热爱使得先锋作家甚至在遣词造句等最微小的小说层面都师法和模仿着他们的大师，这样的结果就使得“马尔克斯句式”席卷整个先锋文坛，而谈玄说怪的拉美式魔幻、机械分类按图索骥的略萨式结构、情绪宣泄毫无节制的福克纳式意识流、末流相声般的海勒式黑色幽默以及吞吞吐吐不得要领的博尔赫斯式语言游戏更是搅得文坛风生水起。这些作品仿佛都经由同一位外国文学教授翻译而出，每一部作品都被其模仿“母本”的光辉照耀着。我们确实应该佩服中国先锋作家有如此出神入化的语言模仿能力，这也应该是他们才气横溢的一个证明。而后者主要是针对先锋作家对于中国古典典籍的态度而言的，中国先锋小说总是逃避当下生存而遁入“历史”的雾障中，这一现象曾经颇令人费解。我曾经把这种“历史”痴迷解释为一种独特的审美追求，如今联

系先锋派的创作方法考察，我发现这种理解实在是太幼稚和理想化了。其实，“历史”只不过是一种障眼法，先锋作家躲在“历史”的外衣里面可以轻松自如地获得创作的灵感和素材。经过西方叙述和语言方式的“改写”，中国传统经典文本如“三言二拍”、“聊斋”、“红楼”、“金瓶梅”等纷纷改头换面活跃在先锋小说的舞台上。我现在终于可以理解先锋作家的“高产”了，“翻译”和“改写”实在不需要什么生活积累和人生体验，只要大量的阅读、适当的想象力和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闭门造车实在可以做到轻松自如。这也就是说，“玩”文学不仅完全可能，而且非常有效率。想当初我们听到苏童桌上堆满了宋元话本之类的古籍时，内心是多么高兴于先锋作家古典文化修养的深厚；而当先锋作家的创作谈里总是开出一长溜西方文学大师的名单时，我们心中又是多么自豪于先锋派的学贯中西。然而，在我们彻底消化了阅读层面上的创新快感之后，先锋派还留给我们什么呢？先锋作家对故事的承诺也曾令我们欣喜若狂，但当这些故事总是以近似的面孔从东西方的经典之中浮现出来时，那种受骗感又是何等的刻骨铭心呢？重复、模仿、重复，这样的循环总令人不寒而栗。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点也不轻视模仿，我觉得模仿也是艺术创造的一个必经阶段和一种特定方式，关于文学艺术的起源不是至今仍有一个无法抹煞的模仿说吗？但问题在于，我们的先锋作家似乎太热衷于模仿了，他们早就应该跨过模仿的门槛了，这些名声上已是大师和准大师的先锋，如果在创作上仍停留在学童阶段像永远不能长大的孩子，这难道不令人大失所望？

再次，先锋小说喜浓厌淡的审美趣味也与通俗小说不谋而合。众所周知，通俗小说是以强烈的传奇性、故事性、动作性等感官刺激手段来娱乐读者的，往往在瞬间的阅读快感消失之